

现存明代最早的插图古本

明
黄正甫
刊本

三国演义 (上)

张志和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国演义

(上)

明 黄正甫 刊本

张志和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演义 (上 下). 明 黄正甫刊本. 张志和整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0-03512-4/K·247

I. 三…

II. 张…

III. 历史小说-中国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542 号

明 黄正甫刊本

三国演义 (上 下)

张志和 整理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7.25 插页 5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99 000

定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明 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封面 国家图书馆藏

張松教場教習



來丞相何慢蜀使操曰張松容貌怪異語言不遜吾故慢之修曰若以貌取人恐失英才之士丞相尚容一桮衡今何不納張松操曰桮衡文華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丞相所作心書壁間松畧觀一遍便能暗記稱言此書乃我國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亦能誦之脩未信松朗誦之如瓶瀉水此世之罕有操令破板焚之修曰此人從蜀中來可使面君交他見吾大國無幾操曰彼不知吾兵法來日往教場點軍汝引來看吾調兵修次曰血張松同到西教場觀操點虎衛雄軍五萬布陣於教場中整頓有法松斜目視之操問松曰汝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人未曾見此但以仁義定天下操正色視之張松全無懼色操又與松曰吾視天下鼠輩如草芥耳大兵到處戰無不克汝無不取順吾生逆吾死吾能令人榮達亦能使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素知止操曰汝既知吾用兵何不畏服松曰丞相昔曰擊陽攻呂布宛城征張綽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于瀾関此皆無敵于天下操

怒豎子焉敢教吾短處啗令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逆通而來入貢殺之恐傷愛之心知者為此人口不遜不知者為丞相嫌禮物之輕故斬來使苟賊亦諫操令亂棒

出版说明

这部黄正甫刊《三国演义》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明代孤本。经本书的整理者张志和先生考证，该书的刊刻时间早于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约二十年以上，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它的整理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和《三国演义》及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原书的全称是《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封面系明天启年间补配，题为《三国演义》，今仍依此题而定名。原书每页均有一幅插图，这次整理时，为便于排版，每节只保留一幅插图随文插入。

原书前有《三国志叙》，题为博古生撰。全文约二百余字，因内容有较多残缺，故不再单排，主要内容在《前言》中有引述。

原书《三国志叙》及目录系明代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正文的刊刻时间应在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年至1506年）。故目录与内文标题不完全一致。兹据正文中的标题对目录作了整理。

原书中有个别残页、缺页及错页，均据嘉靖本补足，并在注



释中作了说明。

原书正文中有若干小字夹注，今仍其旧。凡由整理者所作的注释，则全部放在页脚。其注文仅限于说明整理情况，一般不作文意、词义方面的注解。凡属于一般性的错字、讹字、衍字、脱字，则据文意校改，均不作注。

原书中有个别人名、地名及征引古诗文同其他《三国演义》版本有所不同，为保持原书原貌，均不参照其他版本作校改。

原书目录后有《镌全像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为便于阅读，今将该《附录》移至全书末尾。

原书每卷第一节题目之上，均有“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之x”字样，且个别卷首此行标注文字有出入，如卷一标为“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卷之一”；每卷卷尾或题作“全像三国志传卷之x终”，或题作“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卷之x终”，亦不尽一致。为符合出版要求，本书均在书眉标为“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之x”，每卷卷尾则统一题作“全像三国志传卷之x终”。

特此说明，敬希谅解。

出版者

序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不但深受我国国内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时也是一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名著。

《三国演义》现存于世的明清两代刊本共有三十余种。郑振铎先生于1929年发表过《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认为明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现存各本中最早的，后来刊刻的各种版本都是从嘉靖本演变来的。且各本之间并没有多大出入，就连毛宗岗评本也只是对嘉靖本稍事修改而成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封面及各卷卷首皆题为“晋平阳侯陈寿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于是，罗贯中便被认定为该书的作者。这一结论为历来文学史、小说史家及《三国演义》的研究者所认同。柳存仁先生曾在其《罗贯中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中提出大约是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就可能撰写了《三国志传》，所以他推测在嘉靖本之前还应有稍早的版本。



本书的整理者张志和同志 1986 年在从事学术刊物编辑工作的同时，开始注意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曾写过一些论文发表。1989 年在到河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更集中精力研究这一课题。1992 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确定学位论文题目为《三国演义》研究，重点探讨《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这期间，他调查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广泛地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并进一步从各个角度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者情况及版本源流。他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明代黄正甫刊印的插图本二十卷《三国演义》，这部书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为“明天启间刻本”。这一刊本从表面上看，确实是现存各种本子中出现时间较晚的，但是经过仔细考察，他惊喜地发现，这个黄正甫刊本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盖住了。该书的封面、叙和目录确实是天启三年（1632 年）补配的，而正文却是早年留下来的旧版。他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做了仔细对勘，从书中的诗词、注释、故事叙述及文字运用诸方面获得了不少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黄正甫刊本乃是一个据旧版补配的重印本，其正文部分的旧版的刊刻时间要比嘉靖本早约二十年以上。同时，他还发现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标出作者的姓名，并没有“罗贯中编次”的字样。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到过一个早于嘉靖本的朱鼎臣本，也同样在各卷卷首不题“罗贯中编次”，所以志和认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名字是在明中叶才被标到书上而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的。这应当是当时

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把杂剧作家罗贯中的名字加上去的。这也正是明初与罗贯中为“忘年交”的《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只介绍罗氏的三出杂剧而不提他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因吧。志和钻研了许多资料，分析了各种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慎的考证后，提出了黄正甫刊本是早于嘉靖本的刊本，以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非罗贯中一人之手笔的结论。

当然，我不敢说张志和同志的结论就是如山铁证的产物。但我认为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在本书的“前言”和他的学位论文及其他文章中，他都是尽量地罗引证据并详加论述，力争讲清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学者专家。我只是《三国演义》的一名普通读者，或者说是爱好者，对于《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知之甚少，本没什么发言权。但几年来我看到志和勤勤恳恳地读书，逐章逐节、一字一句地去对照校勘不同的版本，老老实实在地发现、思索问题。一个年轻的研究者肯于坐下来下这样的笨工夫，这种精神和作风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也是值得我学习的。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这个经张志和同志整理的黄正甫刊本印刷行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不是可以轻易见到的版本，这对于考订《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研究它从民间说唱到写成定本的发展轨迹，都是很有价值的。在对本书整理、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方面，如果能引出一些学术性的研讨，也应该是将这个刊本印刷出版的一个积极的贡献吧。

邓魁英

2000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红楼寓所

前 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更是一部明清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名著。这部名著，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定论：《三国演义》乃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著，明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嘉靖壬午本）是该书的最早刻本。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学术界在探讨该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时，自然都是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其人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来作种种分析。但是，这样的“定论”能够“定”得下来吗？这部“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演义》（以下简称黄正甫刊本）的出版，将会向读者说明这样几个问题：明嘉靖壬午本并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罗贯中也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黄正甫刊本就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重要刻本；《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如果上述问题可以得到回答，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换一个角度来透视该书的文化底蕴，而不是只结合一个罗贯中去作种种论述？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究的问题。



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乃罗贯中之原作，且是《三国演义》诸版本中的最早刻本，这一论断是由郑振铎先生最早提出的^①，遂为学界所认同，近年来，又被一些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②，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一看法却几乎是在就嘉靖本论嘉靖本的前提下推测出的，其证据显然不够充分。我们只要看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及柳存仁先生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就会知道，明清两代，《三国演义》的各种刊本不下30种。就国内而言，至今尚存者仍有十余种，而未被著录者更不知有几许（如北京图书馆所藏汤宾尹校正本《三国志传》即是其一）。但解放后只出版了嘉靖壬午本和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二种，其他版本均尘封未启，知见者甚少。当然，也有一些人据其他版本对郑氏的定论提出异议，如柳存仁先生以为《三国志传》应早于嘉靖壬午本而存在^③。但均因未能找到实证，故而信从者不多。现在，我们终于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个黄正甫刊本，从该书中，我们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早于嘉靖壬午本的刻本，而且是今所见

①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载《小说月刊》，第20期，第10号。

② 参见章培恒、马美信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作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2。

③ 参见柳存仁：《罗贯中小说之真伪性质》，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三国演义》诸本中的最早刻本。兹试为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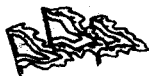
1

这个黄正甫刊本，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如次：

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段，存。明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上图，下文，图上有横标题，半页十五行，大行三十四字，小行二十六字。[北京图书馆]

首癸亥春正月 山人博古生序。次君臣姓氏附录。

不知孙楷第先生著录时是否亲见此书，孙先生定此书为“明天启间”刊本，可能是根据此书前“博古生”作叙所署时间“癸亥春正月”（即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而推测出的，也许未来得及对该书的内文作细致的考察。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亲见此书：封面竖题“三国演义二十卷”，下署“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八字，字略小，分二行竖题。卷首有博古生所作《三国志叙》，文字有残缺，字为手写体；次有“全像三国全编目录”，目录字为仿宋体；再次为“镌全豫（应为“像”，此为原书刻错的字）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正文首行标作“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之一”（以下各卷卷首均有此，有些卷首于“新刻”之后有“京本”字样），下署“书林 黄正甫 梓行”。正文前尚有“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在其他万历以后刻本中或作“全汉总歌”）；再次为正文。自“君臣姓氏附录”以下字体同目录以及“叙”不一致，为较粗糙的简体字。



从上述字体的明显不同这一点看，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明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板。说目录非原版所有，乃是后来据他本补配的，还有一个证据，即该书目录所列题目与该书内文中相应的标题，有一部分并不一致。如目录中卷五“论英雄青梅煮酒”，在正文中却称作“青梅煮酒论英雄”；卷十二“张飞关索取阆中”，正文内标题却是“瓦口关张飞战张郃”。由此完全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据旧版补配的重印本。从正文的版刻风貌上看，刻字较朴拙，且有不少简体字，而嘉靖本以及万历以后诸刻本的字形均较此本为精。从这方面看，它的刊刻时间应当比嘉靖壬午本早。尤能说明问题的是该书前博古生所作的《三国志叙》。其叙云：

圣主当阳，群邪屏息，大权一统，孰敢窥中原而问鼎也？代至三国（以下有残缺）……是以志《三国》者，志其忠肝义胆，昭昭揭日月而行中天也。第坊刻不遵原本，妄为增损者有之，不详考校，字至鱼鲁者有之。予阅是传，校阅不素，剞劂极工，庶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新世聿警心花。

癸亥春正月 山人博古生题

由此可知，这位博古生也是视此书为“不失本来面目”的“原本”的。

从黄正甫本的文字内容上，亦可看出其草创初成的痕迹。上面已经指出，该书的《三国志叙》及目录乃是后来补配的，故可置之不论。其目录后有“镌全豫（“像”字之讹）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在嘉靖本为“三国志宗僚”），这个“附录”中所



列的人物，与嘉靖本及其他本所列基本一致。但此本“附录”中有两句话却为嘉靖本及其他本所无，一是在“附录”之前有“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二是在魏姓氏“别传”后，有“已上皆有本传，惟本堂全像演义，搜补事实，一一载之。故增附录耳”。由此亦可想见此书在最初写定时，据当时的三国故事参以史籍，踵事增华，整理成书的情形。另，在此书卷之七下有“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数字，这样的字句的出现，也只能是最初的写定者据史籍敷演故事时才能留意的。而在嘉靖本中，这样的字句都没有了。两相对照，嘉靖本显然后出，且在刊印时做了一番精心的修饰加工。

当然，如仅以上述理由遽定黄正甫本为早于嘉靖本的“原本”，不免有失之草率之嫌，那么，下面不妨从正文的内容方面作些考校，以见其先后。

2

在黄正甫刊本卷十三《庞德抬棹战关公》和《关云长水淹七军》两节中，曾写到庞德有一部将名叫伍伯，随庞德出战及溺水而死的事。但这个伍伯在嘉靖本中却并无此人，而是以骁将五百人代替了伍伯。仔细对勘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先看黄正甫本中的有关叙述：

德把盏毕，唤其妻并子庞会，年七岁。德嘱曰：“我受主恩，义当效死报。去战关羽，我不杀他，他必杀我。你可善养我儿，他日有志，必报仇雪恨也。”妻子啼哭送别。令车载舁棹而行。骁将伍伯问曰：“将军载棹何意？”德曰：

“汝随我多年，知我心腹。此行与关羽决死战，我若杀关羽，吾自取其尸首置于棹中，回献魏王；我若被关羽所杀，汝可取吾尸置于棹中而回，汝勿负吾也。”伍伯曰：“将军万一有失，吾亦舍头与将军报仇。”

这是其出征时的情况。《关云长水淹七军》中关于伍伯溺水而死的叙述如次：

……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与伍伯力战。正值荆州军数人驾小舟近堤。庞德提刀，跃身一跳，旱上小舟，将数人尽砍下水。伍伯拖枪上舡，二人驾舟欲投樊城，忽上流周仓乘大而来，当头一冲，把德小舡冲翻。庞德、伍伯堕于水中，被周仓下水生擒庞德上筏。伍伯甲重，沉于水底而亡。

这里叙述伍伯之事极其详明，但到了嘉靖本中与黄正甫本相应的段落，其叙述却文理不通了。先看嘉靖本卷之十五《庞德抬棹战关公》一段中的有关叙述：

德把盏毕，唤其妻李氏并男庞会，会方六岁。德与妻子曰：“吾义在致死，今为先锋去战关将，吾不杀关将，关将必杀吾也。我若被他所杀，汝好生看养吾儿。吾儿有异相，长大必与吾报仇雪恨也。”妻子痛哭送别，令抬舡而行。手下骁将五百人，问庞德曰：“将军载棹何意？”德曰：“汝众人随我多年，彼各知其心腹。吾今以大事付汝等，汝等休负吾心。吾今去与关将决一死战，我若被关将所杀，汝等取吾尸回；我若杀了关将，汝等急取他尸，吾当自取其首，置



于棹内，同献于魏王。”五百将皆昂然而告曰：“将军有失，吾等舍颈血，与将军复仇也！”

再看《关云长水淹七军》中的有关叙述：

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一人力战。正遇荆州数百军，驾小舟近堤来捉庞德。德提短刀，飞身一跃，早上小船，立杀数人；被降军五百人皆上船，忙使短棹，欲奔樊城来，上流头一将撑一大船而至，将小船撞翻，庞德并军士尽落于水中。船上那员将跳入水中，生擒庞德上船。军士沉水而死。

两相比照，可以看出，写庞德抬棹出征时，黄正甫刊本中与庞德对话的是骁将伍伯。但到了嘉靖本却成了“骁将五百人”或“五百将”。为“抬棹出战”事，以五百人齐问齐答已有悖于情理，到这五百人死时，就更不可理解了。今看嘉靖本原书，在庞德及五百人战死之前的叙述是：于禁所率七军被水所淹，乃投降关羽。“其五百人尚无百十，立在堤上”，又被“关公将船四面围定，令军放箭射死魏兵大半”。那么，以此计之，五百人先已折损只剩不到一百人，又被射死“大半”，则最多不过只剩四五十人而已。再后来“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一人力战”（黄正甫本中是“止有庞德与伍伯二人力战”），夺得一小船，“被降军五百人皆上船，忙使短棹，欲奔樊城”（黄正甫本中是“伍伯拖枪上船，二人驾舟，欲投樊城”）。姑且不说这“五百人”既已投降，何以能在庞德夺一小船之后，遂又跑了回来，于情理上说不过去，单就一“小船”而言，如何容得下五百人？更何况这五百人早已被关羽射杀殆尽，只剩下四五十人，又何来五百之数？此事叙得糊涂。所以，到了